



# THE STATE OF THE UNION

**2016年歐盟狀況：歐洲和世界舞台的女性**

**歐洲大學研究所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露絲·盧比奧·馬林 (Ruth Rubio Marín) 教授之主題演講**

**2016年5月6日，佛羅倫斯舊宮 (Palazzo Vecchio, Florence)**

(繁體中文譯本<sup>1</sup>)

## I. 簡介

各位來賓、同事、尊敬的官員和朋友們，各位毋論在場與否的母親們：包括那些兼任母親角色的父親們；亦包括此時坐在我的兒子西蒙和盧卡斯旁邊的、我的母親。本人深感榮幸能夠身在這個『五百人大廳』—這個曾經是全體五百人皆由男性組成的佛羅倫斯共和國議會用作會議室的地方，成為今天眾多男性及女性講者之一，談一談歐洲以及世界女性的狀況。

\*\*\*

在座各位，歐洲正處於掙扎當中，是自六十多年前歐盟作為一項經濟、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實驗得以建立以來，一種更深層的掙扎。歐洲正經歷著曠

---

<sup>1</sup> 此繁體中文譯本源自一篇歐洲大學研究院的歐盟狀況演講辭，該演講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在意大利佛羅倫斯舊宮發表。此譯本由 (按姓氏筆劃順序) 莫望塵先生 (Mr MOK Mong Chan, Lewis)、黃衍達先生 (Mr WONG Hin Tat, Henry)、以及戴卓琦女士 (Ms TAI Cheuk Kei Maria Goretti) 在Professor Sandra MARCO COLINO指導下共同完成。

有關引文及參考文獻書目，請參照Professor Ruth Rubio Marín題為 “Women in Europe and in the World: The State of the Union 2016”，14 ICON (2016) 的英文原稿。

日持久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導致嚴重的社會影響。歐洲正面臨著日益上升的恐怖主義威脅，以及民粹主義、排外的民族主義、不同信仰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並沒有完全退去，甚至英國退出歐盟的陰影又日益迫近，體現著眾人對歐洲一體化日益幻滅。成千上萬的難民被淹沒在我們的海域裡，而更多——過百萬的人——在我們的大門外呼叫，卻得不到人道及有尊嚴的回應，而我們心知肚明，這些回應是他們應得的。我們心中明白，當我們的祖先同樣因為迫害、戰爭，以及其他威脅生命的力量而遭受恐懼，敲著同一扇門；甚至在不久以前，我們自己也是加害者。在座有些人可能會捫心自問：在此情況下，這個探討女性問題的學術會議有何作用？

試問，究竟提出婦女問題的所謂適當時機是否存在？如果我們回顧大約一個世紀以前的歷史，當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鬥爭在歐洲不同國家發生時，我們會發現很多女性被勸阻的例子，以經常對她們懷有慷慨和自我犧牲的期望，去造就其他所謂「更重要」或「急切」的、被賦予自由及平等之名的原因：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民族主義運動、保家衛國，或旨在限制舊政權中的教會和君主權力的鬥爭。但我們必須承認，在追求平等和自由時，讓女性參與歐洲的「民主建構」也是當務之急。亦正因如此，我今天將宣稱，歐洲的民主信譽及其對社會公義的承諾在此關鍵時刻正受到威脅，而將決定其成敗的關鍵，恰恰是歐洲如何應對婦女問題。

但你可能自己會問，究竟什麼才是歐洲今時今日的婦女問題——尤其當女性現今已享有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和自由、當我們終於從今天的司法制度中，抹去多年來將女性視為未成年人的父權制那可恥和明確的痕跡？不幸的現實是，今天儘管正式的法律地位平等，佔人口過半的歐洲女性，仍然是受壓迫的一群。這該如何理解？哲學家Iris Young在早逝前於其著作解釋過，一切阻礙人類成為完整的人的行為都稱為壓迫，例如是受到非人化的對待，還是在思想或身體上被剝奪了行使完整人權的機會，都算是受到了壓迫。請記住，壓迫不僅在不良意圖的殘忍暴君底下發生。事實上，一個善意的自由社會不僅可以倚仗公開的規則，亦能藉着不容置疑的規範、習慣和象徵，對團

體施加系統性的約束，並限制其自由。Young指出壓迫有五個面向，分別是：暴力、剝削、邊緣化、無力感和文化帝國主義。

在座各位，我們必須略帶矛盾地祝賀自己，因為我們終於能以實證，說明在歐洲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面對這五個面向的壓逼。以下是自近年發展出來的嚴謹研究和工具中取得的數據，包括二零一四年歐盟基本人權機構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首個全歐盟對婦女暴力的調查、一份橫跨歐盟二十八個成員國對四萬二千名女性所作出的訪問報告。我們也有同年由歐洲委員會對性別平等所作的傑出報告，以及由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作出的性別平等指數報告；這些都對歐盟的性別平等，及其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之間的變化，進行了嚴格測量，追蹤了多個與歐盟政策框架有關之領域的性別差距，這些領域包括工作、金錢、知識、時間、力量、健康、暴力，和交叉領域的不平等現象。

現在我將據此解釋歐洲女性為何及如何繼續受到壓迫，並列出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此外，我將探討未來對歐洲自我理解——即作為一個宣揚民主和平等的地緣政治空間——的影響。而本人認為，她宣揚的價值正正是歐盟的存在意義。

現在，讓我先帶出數據反映的訊息。五個歐洲女性受壓迫的面向從何得以體現？

\*\*\*

## II. 女性受壓迫的面向

### 暴力

首先及最為嚴重的是暴力。

最近，很多公眾注意力聚焦於對移民女性——在西方眼中被東方化的「其他女人」——的暴力，包括作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時有受到性剝削的婦女，和遭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女孩。但FRA的報告選擇了談論我們歐洲女性，而非她們。正如我們自己對今時今日歐盟的認知，每三名女性中便有一名從十五歲已經歷過至少一次的肉體及/ 或性暴力，相等於五千九百四十萬個受害者，而相似的比例亦適用於十五歲以下的女孩。我們尚知道的是，每二十名女性中便有一名、或合共約九百萬名女性，從十五歲起已被強姦過至少一次，這種經歷使倖存者感到恐懼、憤怒、恥辱、焦慮，和喪失自信。我們知道的是，多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五的歐洲女性遭受過性騷擾!!而百分之十八的女性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纏擾(stalking)，而網絡纏擾(cyberstalking)尤其在年輕人之間成為一種新趨勢。然而，我懷疑這些數字尚未反映那些令特別易受傷害女性感到絕望的暴力形式，包括移民女性（其移民身份往往使她們極度依賴丈夫、僱主，或兩者）、尋求庇護者和難民（那些此時此刻正成為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受到官員、蛇頭，和過境區和接待中心的其他難民性虐待的人），或不同能力(differently abled)的女性（根據定義，往往生活在社會和法律秩序邊緣的女性）。

在座各位，特別令人痛心的，可說是每五名女性中便有一名，其肉體或性暴力的經驗來自現任或前度伴侶的手上。與此同時，非常、非常可怕的，是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女性向警方報告了由她們親密伴侶引致的最嚴重暴力事件。

在座各位對此或許有不同的說法，而對我而言，這意味著上百萬的歐洲女性在她們的家園內、學校裡、社區，以及工作場所時，都活在恐怖和受壓迫的狀態中。

\*\*\*

## 剝削和邊緣化

現在談到壓迫的第二和第三個面向——剝削和邊緣化。

目前，女性就業比例仍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五，而女性在同一職業和教育水平所賺取的薪金，只有男性的百分之八十四。普遍來說，幾乎每個員工的收入都是不透明的，這使得性別工資差距(gender pay gap)一直持續至今。更令人擔憂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退休金差距達百分之三十八；另一方面，三分之一的女性得不到任何退休金。這些情況皆令年邁女性以及單身母親暴露於貧窮和被邊緣化的風險中。

職業隔離將女性集中於回報較低的行業。在職女性擔任兼職工作的比率是在職男性的四倍，且大多結合了無償的家務勞動以及受薪的工作。總體而言，達百分之三十七的薪金差異是基於較低的時薪、較少受薪工時，以及高薪職業代表性不足所致。然而，現實中經濟資源上的性別差異十分巨大，可惜我們缺乏基於性別的其他金融資產（例如債券或房地產）的數據。

在座各位，勞動男性現時每星期只花九個小時於無報酬的照料和家務工作，而勞動女性每星期則花二十六個小時，即是承擔了近三倍的負荷。在座各位，現時很多移民女性往往找到低薪的黑市(off the book)工作，擔任保姆、管家，或陪伴老人。這容許高收入的女性增加其市場工作的時間而毋須公共補貼。這種以市場為基礎提供照料服務的解決方案，於短期內可能具有成本效益，但長遠而言缺乏可持續性。輸出移民的低收入國家沒有任何能力從中獲得收入來照料和教育自己的國民，只能依靠(往往是暫時的)自願匯款和日漸耗盡本身的社會資源。

這是Young稱之為剝削的例子之一，即利用人民勞動力產生利潤，卻不提供合理的補償；以及Young所認定的邊緣化，即貶低一群人的社會地位或將他

們排斥至社會的邊緣外，而越來越多單身母親們，偉大的母親們（Eccellentissime madri），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發現自己身處這種境況。

\*\*\*

## 無力感

無力感是壓迫的第四個面向。

儘管女性幾乎代表了在職勞動力的一半，成員國最大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女性比例仍低於四分之一。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她們平均仍只佔各國議會和各國政府的民選議員的百分之二十八。

目前，在歐盟機構的層面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我們仍離平等尚遠。女性在歐洲議會中的比例現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但仍遠離平均線百分之十三。新的歐洲委員會由十九名男性及只有九名女性組成；歐洲法院法官的女性比例僅在百分之二十一；而歐洲中央銀行理事會仍然由二十二名男性及只有兩名女性組成。

毋庸置疑，低收入或移民女性能打破職場中隱形障礙，進入男性主導的權力、權威和決策領域的人數，只有少數。

\*\*\*

## 文化帝國主義

最後一個面向是文化帝國主義。

男性中心主義是性別不公的根源。政治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將其定義為一種文化價值觀的制度化形態，該價值觀賦予男子氣概特權，而貶抑一切女性氣質。男性中心主義的形態除了顯見於法律和政策領域，亦存在於流行文化、用語，以及日常交流（包括在市場）當中。抑或，一如所料，女性恰好（暫且撇除最差劣的薪酬待遇不談）更多時候涉及照料和服務性質、並參與勞動密集型及難以提升生產力的工種呢？在座各位，事實上，照料工作是維持經濟及市場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偉大的母親們（*Eccellentissime madri*）的社會價值並未獲得充分肯定。生產與生育工作之間的二重階級，以及得到諾貝爾獎得主祖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指出、個人回報與社會得益之間沒有關係。在此情況下，薪酬待遇往往由社會規範而非邊際生產力決定。試想想一個由Perrons和Plomien提供的例子：在一間倒閉的英國銀行內，一名留任提供重組提議的前主管人員，其月薪竟是一名有二十年經驗的托兒工作者年薪的三倍半。

\*\*\*

然而，男性中心主義並非歐洲女性所面對的唯一一種文化帝國主義。以異性正常論、宗教，以及種族形式存在的帝國主義亦影響了歐洲女性的生活。這在尋求充分表達情緒及家庭願景的女同性戀者、尋求性及生育自主的吉卜賽女性、尋求法律認可的跨性別女性，或希望在大學內穿戴頭巾的穆斯林成年女性身上可見一斑。

### III. 未來的選擇：歐洲的關鍵時刻

那麼，歐洲過去做了什麼，而歐盟又正在採取何種行動？在座各位，歐洲現在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試讓我向各位解釋：

歐盟自成立以來，一貫提倡經濟增長及社會凝聚力，而這些牽涉到社會經濟不公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終極目標的議題，由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開始，透過里斯本政策(Lisbon Strategy)訂立的經濟、社會及環境支柱，演變為現時歐洲2020規劃(Europe 2020 agenda)所倡導的智慧的、可持續的、共融的增長。

對於性別平等的追求，由羅馬條約的薪酬同等原則開始，並緊接著很多的指令(directives)及政策創新，已經取得顯著的進步，亦已被視為成功實現經濟議程及增長的關鍵。長久以來的目標，是為女性在就業及服務領域提供平等的機會，以及保護她們擔當母親角色時免受歧視，維護歐洲自福利國家主義出現起(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保護家庭及母親的傳統。

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起，歐盟在就業機會並無上限的前設下，制訂了歐洲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令推廣女性就業及性別平等更名正言順，推動了全體歐盟成員改善親子家庭結構及增加了育兒服務，以幫助母親達致更高的就業率。再者，在經濟考慮以外，歐盟及歐洲委員會開始將女性賦權這個更為進取的目標，認可為民主的基本條件，這與在北京會議及行動綱領(Beijing's Conference and Platform for Action)中表述的關注點遙相呼應。發源於歐洲的均等民主已成為不少國家的目標。

遺憾地，如果藉由最新的歐盟政策文件內的目標、手段，及政策制訂環境作出分析的話，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已變得遠不及過往數十年充足和突出。該等議題的急切性在歐洲政策中出現下滑，明顯受到金融及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緊縮措施所影響。不幸地，將經濟危機視作男性為主的觀感，導致應對危機的政策制訂忽略了性別平等的考量。在性別平等政策遭受停止或大副剝減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對性別平等的承擔均有所減少。這



似乎在暗示，這些政策最多只會在當下的危機中分散焦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過去數年毫無寸進。事實上，在對抗暴力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里程碑，例如在2011年通過的伊斯坦布爾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以防止及打擊對女性的暴力和家庭暴力。此外，於2011年起在歐盟層面通過的防止及打擊販運人口指令(Directive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以及2012年通過的受害者指令(Victims Directive)亦值得慶賀。但，除了將育兒假由3個月增加至4個月的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以外，其餘旨在推動女性賦權及消除性別角色差別的立法措施皆不獲通過，包括對產假及工時指令(Maternity Leave and Working Time Directive)以及公司董事會性別平等指令(Gender Balance on Corporate Board Directive)的改革提議。

於是，危機、危機、緊縮，以及更多的危機！然而，女性及性別差距過去在危機及緊縮之下究竟應如何看待？而我們又能從中得到什麼關於歐洲女性前景的啓示？我們能自Karamessini和Rubery的研究中得到三點啓發。

第一，儘管兩性的就業在危機爆發以後皆大幅減少，但在所謂的附加勞工效果(added worker effect)之下，事實上近年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參與率錄得上升。失去工作的女性並沒有脫離勞動市場，而是繼續尋求就業，當中不乏首次加入勞動市場或擔當唯一經濟支柱的女性。在發達經濟體當中，重新回到男性作為唯一經濟支柱之家庭模式，機會似乎不大。該模式的前提是在強大的家庭紐帶下，得以重建傳統家庭結構，以及有穩定的男性就業及家庭薪酬充足的工作。這些前提現時皆難以成立。事實上，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延長兩性共同投入勞動市場是符合整體利益的。

第二，就業環境中性別不公的情況有所減少。不過，主要原因是男性上升的失業率、更廣泛的兼職及彈性就業模式，以及影響兩性的凍薪、減薪，以及工作環境的倒退。換言之，男性的地位下降，某程度上縮窄了性別差距。

最後，在緊縮及財政整頓政策下，公共部門——某程度上因為較為容許女

性同時擔任員工及母親角色——作為女性的主要僱主之一縮減規模，而國家亦不再提倡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並因此減少了對在職父母的支援，以及對老者及傷殘人士的長期照顧。正如女權經濟學家Nancy Folbre指出，這個變化意味著性別不公本身的關鍵性，逐漸不如被標籤為「母親貧窮化(pauperization of motherhood)」以及「貧窮母親化(motherization of poverty)」的趨勢，而後兩者對女性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

展望將來，上述的趨勢似乎指向兩種可能性。我認為只有其一符合歐洲原先對於投入到性別平等、民主，以及社會公義當中的自我理解。

在第一種情況下，現時新自由主義日益壯大的趨勢，以及對於經濟和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的前設，即前者創造財富並具生產力；後者則不事生產，導致支出並阻礙發展，將會延續。很多人認為在此情況下，社會將更趨基於階級和種族的兩極化。這意味著在較低教育或技術水平者以及移民之間的財務及就業環境將會同等化，而在較高教育或技術水平者之間的性別差距將會擴大；這在現今的美國已經實現。這種狀況將加劇兩個群體之間的不均，和兩性整體的就業狀況和前景的惡化。與此同時，對於全國性照料支援的缺乏或對現有供給的削減，可能會導致不同階級和性別的人士有不同的反應。較低學歷的女性可能會增加兼職或無償工作的時數；較高學歷的女性可能會增加對有償家庭傭工的依賴，或與伴侶更平等地分擔無償照顧的工作。在此情況下，最需要支援的較低社會階層的女性、移民女性、年輕女性，以及單親父母，將很可能成為輸家。生育率將持續處於低水平，而家庭及性別的保守意識形態或仍會因而擴散，尤其但不限於較近期加盟的成員國，這可能會加深歐盟內部的裂縫。

在另一種情況下，當代的環球經濟危機，將如很多人提倡的一樣，被視作脫離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契機。眾人應當探討共融性更高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傳統的左翼立場，這種模式有了性別的視角，它也對市場外的行為——包括關懷——進行考慮。這種新的革命性框架將須要繼續挑戰刻板的性別定型

、先決的性別角色，以及加入經濟、環境，以及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考量。其中一環是令女性在每項決策中擁有平等代表權(即均等民主)，而這並不單止意味著維持同等數目的代表，亦須採用創新的性別平等政策手法以及工具，例如性別主流化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性別平等預算。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本質上除了惠及女性，亦對每一個人皆有好處。這需要可負擔而具備質素的託兒、課餘託管服務，以及為無法獨立生活的人而設的照料服務(包括長者及不同能力的人士)的配合。同樣不可或缺的，亦包括為兩性而設的平等及不可轉移的有薪假期，彈性的工作安排(如半職崗位、在家上班、靈活時間)，以及推廣平等分擔工作及照料(包括提供稅務優惠)的創新措施。

\*\*\*

總括而言，唯有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才有希望將今時今日仍對歐洲女性構成壓逼的五個面向所造成的性別差距消除，並克服曠日持久的、對眾多男、女性造成各種傷害的性別意識形態之頑固性。唯有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才有望防止中產及低下階層的環境繼續惡化，令他們不再遭受隨之而來的恐懼、不安，以及被剝奪感；這些負面情緒往往對年青一代(在座各位——這是失落的整整一代人)造成的衝擊最大。這些負面情緒，容易引發尤其以控制女性的身體及性行為為主的原教旨主義，容易導致種族主義、仇外心理，以及民粹主義——將令參與維持養老金制度、維持人口增長、照顧長者及兒童的移民，以及尋求庇護的人生活在地獄之中。這些負面情緒，將會令男性在自覺被閹割的背景下，將建基於性別的階級觀念，視作維護安全感及自我的最後堡壘；將無法令包括年青一代在內的歐洲男性，摒棄盧梭(Rousseau)會形容為「主人對奴隸的幻覺(illusion of the master over the slave)」，亦即男性主導的思想。這意味著女性的痛苦將繼續下去。在座各位，偉大的母親們(Eccellentissime madri)，如果放任這些負面情緒肆虐橫行，歐洲對於平等及公義的承擔，以至於民主信譽，都將蕩然無存。

因此，當下正是前所未有的、提出婦女問題以及其他密切相關議題的最佳時機。而這個座落於佛羅倫斯——作為推翻了種種中世紀教條主義的文藝復興以及人文主義的搖籃——於美第奇家族遭到放逐後、在1494年建成的五百人大廳，亦堪稱最適當的場所。此時此刻，我們同樣需要摒棄圍繞著缺乏監管的金融市場、緊縮財政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以及人類自主的教條，才能夠真真正正面對及處理婦女問題。或許，每一位男、女性，皆須要在不同種類的暴政及其現代形式當中，得到文藝復興式的救贖。

多謝各位！